

## 《闻道》2019年第3期精彩推送

【编者按】《闻道》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发行的一份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自创刊以来，《闻道》一直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办刊理念，力图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习练的舞台。

在本期的推送中，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2019年第3期《闻道》。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周一平先生，听周先生讲述南南合作以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大国纵横板块精选三篇文章，纵览大国动态，讲述大国如何参与国际政治。全球视野板块带我们走近美国、俄罗斯以及韩国的视角，探究他们的“古往今来”。百花齐放板块向大家分享学长学姐对于学习、实习、求职的经验体会。



SAIAS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 闻道

2019年第3期 总第27期



- 外交官访谈：听周一平先生讲述南南合作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
  - 张子琰：帝国历史记忆对俄罗斯的影响
  - 王弘毅：冷战后美国中东欧战略的演变：遏制与平衡
  - 沈钦韩：新闻的姿态——披荆斩棘
-



2019年第3期  
总第27期

主 编：  
江 源

本期执行主编：  
曹宇航

编 辑：  
(按拼音字母排序)  
陈 卉 陈瑞琼 李 睿  
沈丹丹 徐晓晨 夏 菁  
殷 悦

封面题字：  
冯绍雷 贝文力

本期指导老师：  
阎德学 鲁 静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 目 录

### 卷首语

林花谢春红，太匆匆  
..... 曹宇航

### 外交官访谈

听周一平先生讲述南南合作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  
..... (01)

### 大国纵横

复合相互依赖的印度俄罗斯关系论析  
..... 杨胜兰 (08)  
美国对中俄“软制衡”战略比较分析  
..... 赵亚娜 (32)  
从三个变量的角度看日本反美情绪对  
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及生效的“无能为力”  
..... 余抒芮 (44)

### 全球视野

遏制与平衡：冷战后美国中东欧战略的演变  
..... 王弘毅 (56)  
帝国历史记忆对俄罗斯的影响  
--以克里米亚事件为例  
..... 张子琰 (72)  
冷战后韩国的斯拉夫欧亚国际关系研究综述  
..... 朴荣浩 (85)

## 百花齐放

- 新闻的姿态, 披荆斩棘  
.....沈钦韩 (98)
- 鹅厂风景  
.....刘立成 (101)

## 国关要闻

- 我院组织师生代表团赴京开展国际问题  
研究学术交流  
..... (103)
- “大使讲坛”举办第七讲, 鲁桂成大使  
回顾中苏边界谈判历史  
..... (107)
- 齐大愚大使做客“大使讲坛”, 剖析百年  
变局与中国外交  
..... (109)
- 我院举办  
“第二届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 (110)
- 共享学术饕餮盛宴, 迸发青年思想火花  
--记第九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  
..... (113)
- 2019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  
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在我校成功举办  
..... (118)
- 我校启动中挪俄三方联合培养硕士项目  
..... (122)
- 22场精彩活动开启国关新生之旅  
..... (125)
- “瓦尔代”专家对话会暨中俄关系高端  
研讨会在莫斯科成功举办  
..... (129)
- 我院冯绍雷教授获颁“瓦尔代贡献奖”  
..... (132)

## 《闻道》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闻道》(季刊)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刊,由华东师大国关院主办,是学生自主管理发行的学术思想人文刊物。编辑部成立于2010年12月,2011年3月发行第1期。

本刊坚持“以学术为主,不惟学术,百花齐放”的理念,设有国际问题研究、学术随笔(含书评)、文艺专栏等特色栏目。

##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座406室(邮编200062)

邮编: wendao\_ecnu@163.com  
网站: <http://www.saias.ecnu.edu.cn>

注: 未获本刊事先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 外交官访谈·周一平先生



周一平先生曾任联合国南南合作特设局（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前身）副局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特设局局长、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2016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周一平先生担任国际丝路研究院院长及讲席教授。

周一平先生在访谈中讲述了联合国南南合作的工作、其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并寄语国关青年学子，鼓励我们薪火相传，努力构建起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要一味跟随在西方“头雁”的雁阵后面。

## 杨胜兰：复合相互依赖的印度俄罗斯关系论述



苏联解体以来，印度俄罗斯保持了印苏时期的传统合作关系，双方在政治、军事防务、能源等传统领域建立了多渠道的合作联系，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并没有体现出领域的等级之分、好坏之别。军事力量在印俄关系中起到的是“负反向”作用，即双方在军事领域不是对抗或威慑，而是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于印俄关系的分析，解释了印俄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体现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解释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和看待印俄关系的新视角。

## 张子琰：帝国历史记忆对俄罗斯的影响

### ——以克里米亚事件为例



米·莱蒙托夫曾有诗云：“一座神庙，虽然荒芜，仍然是神庙；一座祭坛，即使坍塌，依然是神。”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以这样的一个“孤独的混血儿”的形态，怀抱着历史留给自己的精神遗产，在自己的道路上踽踽而行。俄罗斯会应验“受地缘政治驱动的围剿政策可能会失去吸引力，对那些成长于军事实力、现实政治和伟大国家为背景的精英也是如此”的判断，还是终将能够“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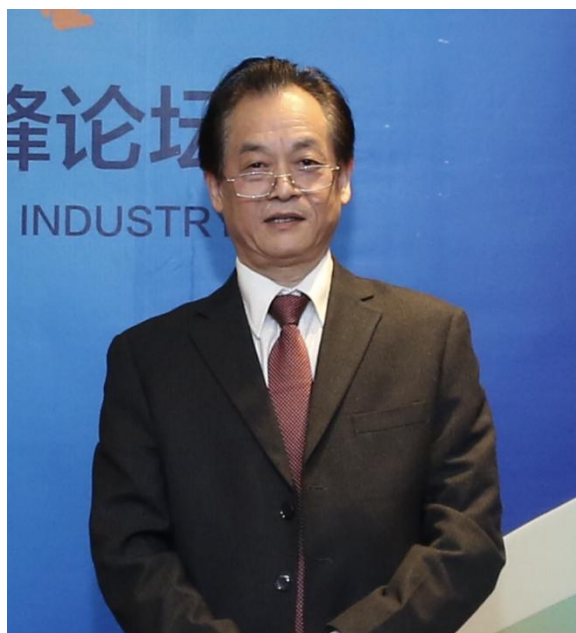
历史的独特传统与现实的国际形势结合起来，超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对峙”，取决于俄罗斯今后的道路选择。若能铭记历史，化为历史记忆动力，与时俱进，并且充分尊重现代国际社会的法律和周边国家的自由意志，俄罗斯的独特性或许能够为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自己的范式。

## 沈钦韩：新闻的姿态，披荆而行



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是学校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习惯的培养。不管从事何种职业，求学期间形成的习惯都将获益终身；其次，求职并不局限于秋招或者来年的春招，求职是一个漫长且不断更新完善目标的周期；此外，要辩证看待实习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求职者要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求职选择。如果想尝试新领域，也大可以做足准备，与相关有经验的前辈们多做交流，夯实自身的基础。

## 听周一平先生讲述南南合作及对青年学子的寄语



周一平先生，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5年就职于联合国系统，曾任联合国南南合作特设局（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前身）副局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特设局局长、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2016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特聘周一平先生担任国际丝路研究院院长及讲席教授。

**《问道》：**周老师您好，感谢您精彩的讲座。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长，现在已经是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那么中国在南南合作方面有什么角色或者战略上的变化呢？

周一平：你们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我先谈一下南南合作。南南合作简单的讲它发展中国家（也叫南方国家）之间开展的互帮互学、互助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它所尊崇的合作原则就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合作大会（也叫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从那时起，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我是1999年开始担任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当时叫特设局）副局长，2004年起担任主任一职。在这之前，由于历史原因，南南合作在联合国是个“政治”议题，甚至是一个“边缘”话题。这是因为在联合国内代表132个发展中国家的“七十七国集团”希望通过



南南合作来提升在联合国的地位。同时，通过“集体抱团”在南北对话中增强跟西方发达国家（也叫北方国家）的“集体谈判权”。而北方发达国家普遍不接受南南合作的“五项原则”，特别是关于“互不干涉内政”这一条。我的任务就是要将联合国框架下的南南合作从一个“政治议题”和“边缘话题”原来变成一个“发展议题”和“重要议题”。这一点，我们通过联大决议实现了。现在，南南合作是历届联大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第二是要使南南合作制度化、机制化。通过联大决议我们成立了联合国系统南南合作领导小组，同时要求所有联合国机构设立南南合作协调员制度。第三是创新南南合作我们通过创新“三方合作（Triangular Cooperation）”和 PPP 伙伴关系，建立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论坛、和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等平台，实现了南南合作多元化、规范化和规模化。

关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后在南南合作方面的角色或战略，我想说的是，我们国家的 GDP 总量现在确实已经是世界第二。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2-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 34%。国际货币基金数据也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 14 年居首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确实引人注目。但是，除了综合国力和 GDP 总量以及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2018 年，美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 6.5 倍，它的人均收入是我们的 11 倍，它的人均居民消费是我们的 15 倍，它的人均医疗支出是我们的 22 倍。而且，我们国家目前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不平衡。东部一些一线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发展比较好。但我们看三四线城市、农村，这些地方的发展不仅远不如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还不及一些中等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担当的大国。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共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想，首先是南南合作也要有新的理念。我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该成为南南合作的愿景和理念。第二是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我们的南南合作模式也要从过去的“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甚至是“合作兴渔”转型升级。一方面，我要继续向南南国家传授中国式的治国理政之道、经济结构改革、工业发展、能源环境治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第三是加强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引进联合国框架下开发的“三方合作”，和李克强总理与 2015 年提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新型合作模式。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与南南国家的发展

战略对接，比如与非洲的工业化 2063 议程对接。大家知道，按照联合国的产业分类，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有能力帮助有需要的南南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根据他们自己国家战略和资源禀赋逐步建立起符合自己国情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能源和环境治理体系等，引领南南国家共同进行新旧动能转换与产能升级。

**《闻道》：提到南南合作，我们不得不提及当前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这是能够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倡议。我们注意到周老师您现在在研究“一带一路”，又曾经在联合国工作多年，那么您觉得中国如何运用联合国等类似的国际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利用这些平台讲好中国故事？**

周一平：首先“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向全球发起的伟大倡议。“一带一路”弘扬的“丝路精神”及其内涵与南南合作所弘扬的“万隆精神”及其内涵是一脉相通的。我们回溯历史，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侵略，我们没有去“圈地”、去殖民。西方的大航海活动没有我们所讲的“丝路精神”，其政治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实际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都与“丝路精神”相悖。我们不是想输出什么，我们只想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经验与机遇。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联合国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这种经验，中国也已经到了提供新的道路、路径和方法的时候了。我在前面说了，我要继续向南南国家传授中国式的治国理政之道、经济结构改革、工业发展、能源环境治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等。

至于如何利用好联合国的资源与平台，我想首先是要做好自己讲好自己发展的故事。我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系统集成的“中国方式”解析中国发展的逻辑。二是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和南南合作的议程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理念和愿景，从原则和目标，从方案和框架，从机制和实操进行全方位的对接。三是要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大力培养“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管理人才。四是要与联合国一道共同探索和创新发展融资，特别是开发性金融，真正帮助“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国家在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五是要加强与联合国已有的发展合作平台和南南合作机制建立起制度性安排。比如联合国南南发展研究院（目前已升级为南南指向星空网络）、联合国南南发展博览会、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总部在上海），以及有五个联合国机构支持的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等。我认为“一带一路”是我们拓展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多边南南合作的大框架。在这个大框

架下，不仅是沿线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共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南南合作新路”。我甚至认为，“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七路”建设（即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廉洁之路、健康之路、文明之路、和平之路）完全适用于“南南合作新路”的建设。

**《闻道》：**感谢周老师详细的讲解。听完您的看法和分析，我们都很想深入了解国际上的活动，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当代青年学生，如何能够参与国际组织生活，为咱们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一平：青年学子可以去参加与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逐渐形成自己的全球观、国际观、人类价值观。你们也可以举办论坛，来一场头脑风暴的思想交流，讨论当今国际上的热点问题，或者是有关“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的一些想法。

你们不一定就要去联合国现有的机构工作，因为联合国的机构也是在不断演进。你们可以去其他的国际组织，去感受世界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谈及这方面，有一点我一直在思索，也是想要启发你们思考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一直想要进入由西方构建的体系、组织，那么为什么不能让西方人进入我们构建的体系、组织呢？所以，我们的未来，是需要自创话语体系的，而不是一味地跟在西方“头雁”的雁阵后面。中国的外交事业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尤其是你们这样优秀的青年，是需要更多思考的。

**《闻道》：**非常感谢周老师的精彩讲座以及接受我们的专访，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们也会更加努力。

（采访稿整理：叶予民、路琳）

（责任编辑：曹宇航）

# 复合相互依赖的印度俄罗斯关系论析

杨胜兰（我院 2018 级博士生，此文由第十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指导老师推荐刊发）

## 一、引言

2019 年 4 月 3 日，波兰国防大学教授、欧亚研究中心南亚专家克日什托夫·伊瓦尼可（Krzysztof Iwanek）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评估纳伦德拉·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对欧洲的外交政策》（Review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Europe Under Narendra Modi）的文章。该文章指出，印度的外交政策可以定义为“超越政治分歧的延续和没有革命的渐进改变”（continuity above 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of gradual changes without revolutions）。据统计，在 2004-2014 年的十年间，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访问欧洲国家的次数中俄罗斯居于第一位（9 次），其次是德国（4 次）、英国（3 次）、法国（3 次），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和意大利（各 1 次）。在 2014 年莫迪执政以来的五年间，他已经访问的欧洲国家中俄罗斯和法国为 4 次，瑞士和英国为 2 次，其余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各为 1 次。由此看来，印度高度重视其与传统友邦俄罗斯的关系。印度外交部自 2012 年起发布的《印度俄罗斯关系》“India-Russia Relations”年度报告中前言部分都会提到：印俄关系是久经考验的朋友。尼维蒂塔·昆都（Nivedita Das Kundu）也曾表示，印度俄罗斯之间是源远流长的平等关系，可追溯至 20 世纪，当时印度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而俄罗斯是沙皇统治政权。

作为南亚大国，印度不仅重视其在南亚的地区影响力，还重视其与域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印度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可追溯至前苏联时期，虽然两国关系也曾出现过低谷，但两国关系总体表现出平稳向好的态势。总体来看，印度与俄罗斯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苏联解体后，印度与俄罗斯在冷战期间的印苏“盟友”关系之上发展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双边关系更是体现出“互惠性”特征。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布局不仅影响着南亚地区，同时也对我国周边外交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印度作为俄罗斯在南亚发挥地区影响力的主要支点和走向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印俄关系是俄罗斯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俄罗斯首倡的中俄印三边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俄罗斯与印度都为我国周边大国，对印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对我国周边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本文研究的问题不是对印俄关系进行历史文献的梳理，也非对印俄关系的发展进行逻辑演绎，而是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印俄关系进行考察。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辅之以理论阐释，对印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论证并加以总结。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一）文献回顾

单纯从印度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以“印度”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可找到 97836 条结果。同时以“印度”和“俄罗斯”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虽然显示可找到 2973 条结果，但是直接与印度俄罗斯之间双边关系相关的文章寥寥无几。其实不然，虽然我国国内学术界对印俄关系研究的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较少，但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对印俄关系较为关注的是俄罗斯与印度为什么重视相互之间的关系、印度俄罗斯军事合作关系、印度俄罗斯经贸关系以及印度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等方面。然而，在国外学术界中对印俄关系的讨论也较少，现有文献资料侧重于讨论印俄关系的文化战略关系、传统的友谊关系、苏联解体后的印俄伙伴关系以及印俄军事、经济、核工业等方面。在印度学者看来，关于印俄关系的当代学术出版物几乎总是提到在前苏联广受欢迎的拉杰·卡普尔（Raj Kapoor）的电影和印度茶，再往前追溯，人们常常会回忆起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与里奥·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亲密关系。印度有关研究印俄关系的文章可见于《印度评论》“India Review”、《印度外交事务期刊》“India Foreign Affairs Journal”等。

从上述文献资料的归纳可以体现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印俄关系的研究分析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侧重于印度与前苏联关系的研究。很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印苏关系的历史基础延续，进而分析苏联解体以后的印俄关系。随着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双方在经贸、科技、教育、能源、信息和军事武器采购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孙健基于对印俄在扩大合作范围的现实中分析了双方关系越加密切的原因以及对我国的潜在影响。但是他在评析印俄关系时没有离开历史的逻辑演义，从苏联时期的印俄关系着手开始进行分析。这一特点的研究分析为全面了解印苏关系的早期发展以及在冷战后的印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二是基于转型国家发展的视角分析印俄关系。一般转型包括政治体制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但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转型问题时往往选择的是经济转型。以王湘琳为代表的学者对印度、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印俄两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都决定了其转型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两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又是存在差异的，相比之下印度的经济转型更符合其本国的国情。当然，经济发展无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其增强国力的关键因素，尤其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像俄罗斯这样地域广袤的国家。这一特点的文献为我们看待印俄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相对全面的信息。

三是注重印俄在军事、科技等硬件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印（苏）俄传统上的军事合作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虽然在苏联解体后遇到过一段微妙时期，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两国又全面重新恢复了军事上的合作。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喀提克·波马堪提（Kartik Bommakanti）认为印俄军事科技合作关系是一种超越商业的关系，并且自苏联解体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虽然关于印俄军事合作在美国和以色列加入之后更加具有了竞争性，但是俄罗斯为印度提供依然是可靠、廉价、优质的军事装备，依然是印度最大的军事装备供应商。印度前任驻俄大使拉加万(PS Raghavan)曾表示，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说过，俄罗斯将永远是印度的主要国防盟友。印俄军事科技合作作为当前两国关系的主要纽带，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关于印俄军事科技合作的研究为我们在认识印俄防务合作、科技合作等方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总的来说，以上文献研究特点为较为全面地了解 and 认知印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有助于理解印俄关系中的主要组成要素，但目前尚不足以全面理解印俄关系的全貌，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首先，大部分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对印俄关系进行历史演绎分析，缺乏理论的分析与支撑。其次，除上述特点之外，印俄关系中也存在着经济上往来，只不过相比较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合作要逊色很多。印俄同为金砖国家（Brics），两国经济发展在目前看来存在着可观的前景，特别是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因此，分析印俄关系时经济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虽然印俄关系中的军事科技合作等领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过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看法。其实，印俄整体关系中呈现的是一种复合型相互依赖的关系。

## （二）理论分析

分析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之前，有必要先对相互依赖理论进行探讨。相互依赖最先应用于心理学，主要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问题。在心理学上，相互依赖理论通过对情境结构的全面分析，确定了人际情境最重要的特征，并描述了结构对理解个人内部和人际过程的影响。经过扩大化的相互依赖也运用到了世界政治的研究中，在这方面最著名的集大成者要数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问题。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是指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

其实，关于相互依赖的探讨存在于多个视角。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外，大卫·鲍德温（David A. Baldwin）也对权力与相互依赖进行了概念性的分析。他认为，概念分析有助于阐明相互依赖的本质，但它不能回答相互依赖的程度、变化速度、变化方向或结果等问题。苏珊·麦克米伦（Susan M. McMillan）从相互依赖与冲突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相互依赖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不仅需要考虑到国家间成本与收益，还要考虑贸易量的问题。现实主义考虑的是相互依赖的代价，自由主义考虑的是相互依赖的好处，但都没有提出相互依赖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麦克米伦看来，成本和收益对于理解相互依赖和冲突之间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多视角的分析无疑为理解相互依赖展现了全方位的信息，但在此不得不问：复合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是什么关系呢？什么是复合相互依赖呢？这也是分析印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瓦赫达·拉娜（Waheeda Rana）看来，相互依赖不仅意味着行为体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而且还意味着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其特征是在若干不同领域的合作、依赖和相互作用，以及冲突。而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理论，它强调由于联系日益密切，行为体变得相互依赖，容易受到对方行动的影响，并对相互的需要敏感。与相互依赖相比，复合相互依赖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不仅仅是单个领域的体现，更多的是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等复合因素在内的系统体系的综合表现。关于复合相互依赖的定义，马克·杰内斯特（Marc A. Genest）给出了经济学层面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跨越国际经济的概念，国家不是唯一的重要角色，社会福利问题和安全问题在全球议程上也处于中心位置，合作和冲突一样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而邵忍丽则根据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的复合相互依赖的三的基本特征给出了其定义，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可定义为：不使用武力、问题之间不存在等级结构、各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的一种理论的抽

象而非现实的描述。无论出于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形成的相互依赖，还是包括多渠道联系在内的复合相互依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各国关系的现实，也越来越反映出世界某些地区的现实。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大致知道了复合相互依赖是什么以及它与相互依赖有何区别联系。那复合相互依赖有何特征呢？既然作为一种理论，它对现实具有解释力吗？这就需要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入手进行探究。在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他们将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一是各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联系，主要包含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以及跨国组织等；二是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三是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基于上述三个基本特征，冷战后的印俄关系发展也在多个领域呈现出符合相互依赖的特点。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观点，不过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也坦诚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并不能够完全真实地反映世界的现实政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复合相互依赖能更好地解释世界政治的现实。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世界已变成信息的“地球村”。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开始进入一个相互依赖的新时代，行为主体多渠道、多形式的交往更加频繁。

通过上述阐释，复合相互依赖既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也符合当前日益形成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印度、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同时也是金砖成员国和我国周边大国，复合相互依赖的双边合作与联系正在影响着并将长期影响着两国关系和我国周边外交政策。

### 三、印俄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分析

印度与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印度独立 70 多年来，印（苏）俄总体保持积极的、相互友好的双边关系，尽管在 1991 年两国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两国关系仍保持着相互友好和政治信任的特点。俄罗斯作为印度长期存在和久经考验的伙伴，印俄关系的发展已成为印度对外关系的支柱。自 2000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并签订《印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以来，印俄关系在政治、安全、经贸、防务、科技、文化等几乎所有双边关系领域的合作水平都有所提高，具有



了新的性质。

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两个世界主要大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其他诸如民间交往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些领域的合作联系已经强于两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联系。依据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印俄关系的种种表现无不体现出其基本特征，甚至在部分相互依赖的领域已经超出其特征所能解释或概括的范围。

### （一）双方多渠道联系

苏联解体后，印俄关系出现了一段时期的观望停滞。用印度著名智库梵阁门：印度全球关系理事会（Gateway House: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的话说——苏联解体后印度与俄罗斯在政治方面的关系存在两年的相对不确定性，前者不确定和不愿意与任何国家进行特权交易，而后者也未确定俄罗斯在未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1993年，叶利钦首次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双方签署了一项新的但不具有约束力的友好合作条约。虽然这份合作条约省略了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订的防卫安全条款，但是在科学技术、军事技术、文化和贸易领域的合作被提到了双方未来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在这之后一直到2000年普京成为总统之前的几年中，印俄双方关系可以说是停滞不前，并且还出现了某些合作领域的倒退。如1992年至1997年期间两国的军事合作下降了90%，1998年提出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但由于双方原因未能缔结。

冷战后印俄关系真正奠定坚实基础始于2000年。200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参加了印俄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印俄首脑年度峰会，双方签署了《印度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承诺在政治、经济和贸易、国防、科学和技术以及文化领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双方还签署了17项协议，涵盖经济、国防、核能和传统部门合作，主要武器交易等达30亿美元。以印俄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为契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双边政治互信也不断加深，全方位合作正在逐渐开展并不断深化之中。

#### 1. 政治互信加强，为多渠道联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印度视俄罗斯为一个久经考验的老朋友，在经济发展和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0年普京总统首次访问印度，开启了印俄两国定期举行年度首脑峰会的惯例。两国每年轮流举行一次峰会，到目前为止，印俄双方已连续举办19次年度峰会（见表1）。每次双边年度峰会都有两国最高领导人出席，在年度峰会上印俄都会达成一系列双边协议或签订备忘录，有时双边军事合作会成为峰会

中两国领导人直接谈论的话题。通过年度峰会机制，印俄在取得双边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开展了多领域的合作。在所有交往机制中，国家首脑的定期交流起着关键作用，他保持了高层级的对话，对以国家力量的优势推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双方确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也正式确立了双方首脑互访机制。

表 1 印度-俄罗斯历年首脑峰会情况表

届次	时间	举办方	主要内容
第一届	2000年10月	印度	签署《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
第二届	2001年11月	俄罗斯	签署《国际反恐的莫斯科声明》、《关于战略问题的联合公告》，以及其他领域合作的双边文件。
第三届	2002年12月	印度	签署两个俄印声明，分别是《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加强和提升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声明》。
第四届	2003年11月	俄罗斯	签署 10 项文件，如《对世界安全稳定的全球挑战和威胁的印俄政治声明》、《印空间研究机构和俄航天局在和平开发利用外太空合作上的谅解备忘录》、《印科技部和俄科学院关于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的协定》、《俄外贸银行和印出口信贷担保机构的谅解备忘录》等。
第五届	2004年12月	印度	签署 11 项文件，如《共同发展、长期合作、和平利用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协定》、《圣彼得堡行政机构与孟买市合作协议》、《俄天然气公司和印天然气当局的战略合作协议》等。
第六届	2005年12月	俄罗斯	签署数项协议，涉及航天、格洛纳斯导航系统、知识产权等。
第七届	2007年1月	印度	普京发表讲话，称赞“现代战略伙伴关系”。
第八届	2007年11月	俄罗斯	签署 3 项政府间协议。普京和辛格指出，俄印在重要的国际问题有共同或相似的立场。
第九届	2008年12月	印度	签署 1 项政府间协议。军事技术合作和能源合作成为这次峰会的重要主题。
第十届	2009年12月	俄罗斯	这次峰会关注的问题是印俄经济合作，如能源、运输、冶金、信息技术、医药业、生物技术、军事技术合作。
第十一届	2010年12月	印度	签署 30 个双边文件。本次会谈关注油气部门、核能、高新技术等合作。

第十二届	第 2011 年 12 月	俄罗斯	签署《深化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以适应不断变化世界挑战的联合声明》。
第十三届	第 2012 年 12 月	印度	签署《印俄共同利益与美好世界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第十四届	第 2013 年 10 月	俄罗斯	签署《深化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印俄联合声明》。
第十五届	第 2014 年 11 月	印度	签署 20 余项双边协议。包括民用核能领域、防务和贸易等。
第十六届	第 2015 年 12 月	俄罗斯	最终签订包括加强防务和核能领域合作在内的一系列主要协议。
第十七届	第 2016 年 10 月	印度	签署 16 项协议。
第十八届	第 2017 年 6 月	俄罗斯	签署 5 项协议。包括经济、文化交流和核能合作等。
第十九届	第 2018 年 10 月	印度	签署 54.3 亿美元“凯旋”导弹系统订单、8 项协议和备忘录。

资料来源：第一届至第十二届数据来源于李冠杰：《一种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印俄战略合作的成效与前景》，《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49 页；其余资料笔者根据印度外交部网站、印度网站、careerride 网站、jagranjosh 网站相关资料整理而得，参见

<https://www.mea.gov.in/in-focus-article.htm?20970/13th+IndiaRussia+Annual+Summit> ,  
<https://www.india.com/news/india/15th-annual-india-russia-summit-narendra-modi-meets-vladimir-putin-218489/>,  
<https://www.careerride.com/mchoice/18th-annual-india-russia-summit-held-agreements-signed-30212.aspx> ,  
<https://www.jagranjosh.com/current-affairs/19th-indiarussia-annual-bilateral-summit-india-signs-deal-with-russia-to-buy-s400-triumf-missiles-1538744601-1>。

印俄政治上的定期交往，长期高层互动，为两国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可靠的、坚实的基础，保证了多渠道联系的顺利进行。正式因为如此，印俄关系在印度学者看来，两国关系是相当独特的。因为很难找到其他国家与印度有如此多的共同利益以至于能够使两国走到一起，比如两国在全球事务问题上的处理方法如此的接近、当前政策的相似以及共同对地缘政治的关切。

## 2. 防务合作，印俄合作的基础和纽带

防务合作作为印俄关系的传统领域，开始于冷战期间并有着长期的和深入的合作基础。国防领域的合作仍然是最有力的纽带。即使在今天，印度国防军使用的大约 50% 的国防装备都是俄罗斯制造的。关于印（苏）俄初期防务合作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冷战期间印度从刚独立中起步，百废待兴，而此时正是苏联在南亚地区扩展影响力的有利时机，因此印苏防务合作一拍即合；另一种观点认为冷战期间印苏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和地缘政治环境，因此印苏开展防

务合作符合两国利益。在现在看来，这两种观点对冷战期间两国各有所需的情况下进行相互合作带有时代的韵味，但第二种观点在当下仍不过时，只是当前面临的共同威胁发生了变化。

从历史上看，自十九世纪 70 年代以来，印度军方一直由俄罗斯装备主导，其中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印度向俄罗斯进口的武器装备占其进口总数的 82%（见图 1）。但这一主导地位在 2011 年到 2014 年之间出现了变化，在这期间美国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系统供应者（supplier of weapons systems）。上世纪 60 年代至 2011 年间，俄罗斯向印度提供了价值约 400 亿美元（560 亿美元，按目前换算率计算）的军事物资，而美国在 2011 年至 2014 年间向印度出售了价值约 47.5 亿美元（67 亿美元）的武器和设备，俄罗斯以 37 亿美元（52 亿美元）成为其第二大供应国，法国紧随其后，拥有 17.5 亿美元（24 亿美元），以色列大约有 5 亿美元（7 亿美元）。尽管如此，印俄防务合作关系依然强劲，双边防务、军事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加深并且呈现出技术转移合作的新特征。印度仍然是俄罗斯军事装备和联合生产的最大“客户”。2014 年 12 月，印俄签订了签订防务协议，俄罗斯向印度全技术转移米-17 和卡-226T 直升机（Mi-17 and Ka-226T helicopters），印度将每年从俄罗斯获得 400 架次卡莫夫（Kamov）直升机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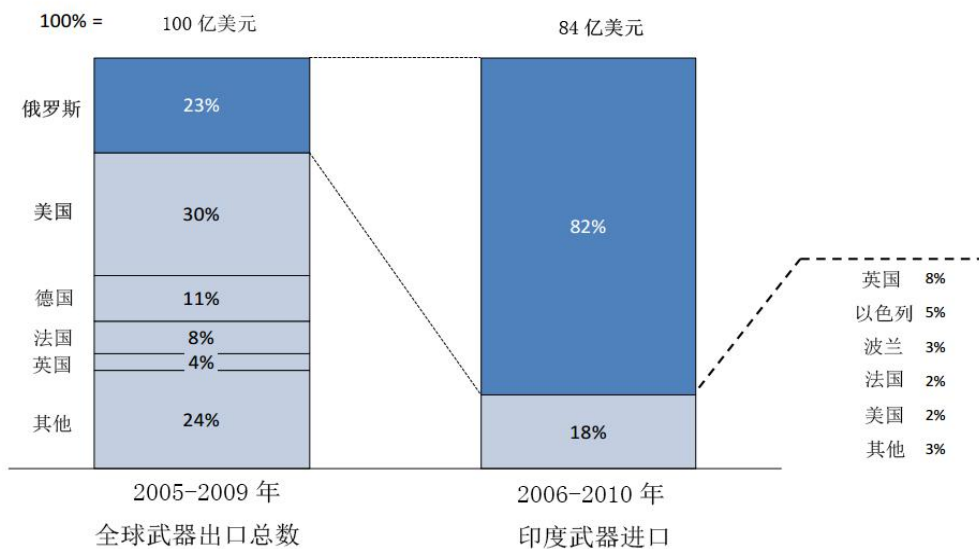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0 年印度武器进口占比

数据来源：Katherine Foshko, “Re-energising the India-Russia Relationship”, *Gateway House Research Paper*, No. 3, September 2011, p.32.

2018 年 10 月，莫迪总理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价值 70 亿美元的协议，这包括

完成 S-400 防空盾牌系统的最后阶段,而印度准备采购 5 个兵团数量的这一装备。S-400 防空盾牌系统可以打击所有类型的空中目标,包括飞机、无人机、400 公里射程内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高度可达 30 公里并且可以同时攻击 36 个目标。从军事装备出售与合作方面来看,2011 年至 2014 年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出现了下降,降至第二位,但是在 2014 年至 2018 年两国军事装备合作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2014 年至 2018 年,印度对外军事装备进口中,俄罗斯位居第一(占印度总进口比的 58%)、其次为以色列(15%)、第三为美国(12%),占世界总军备进口的 9.5%,较 2009 年至 2013 年下降了 24%。

俄罗斯作为印度的传统防务军事合作大国,两国的合作足以影响世界军售市场。长期以来,印俄军事、防务合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成果丰硕,在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军事、防务合作未来也将继续强化。

### 3.能源合作,双方联系趋强

近年来,印度的碳氢化合物消费量快速增长。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进口国,其 65%的石油来自国外。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从 2001 年的每天 300-350 万桶将增加到 2020 年的每天 500 多万桶。此外,印度还进口了几乎一半的天然气需求。而俄罗斯作为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之一,每年有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就俄罗斯当前的年产量和出口量来看,完全有能力满足印度的这一需求,而印度也可对俄罗斯出口能源带动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因此印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有着可观的前景。

自印俄 2000 年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以来,双方能源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2010 年,印度对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领域累积投资已达 42.5 亿美元。为了缩短印俄之间的石油运输距离,印俄在 2014 年开启了一项世界上最昂贵的石油运输管道计划,该管道通过中国的新疆,价值 300 亿美元。此外,印俄能源合作还在商业公司之间开展,双方合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il and Natural Gas Corporation Limited) ONGC Videsh Limited(OVL)也参与了俄罗斯西伯利亚萨哈林 1 号(Sakhalin-I)海上天然气开发项目,并拥有其 20%的股份,该公司还在寻求萨哈林 3 号(Sakhalin-III)天然气开发项目的股权。由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各种纠葛与矛盾,其输往欧洲的石油天然气经常出现“断气”现象。为了避免单一地区出口导向影响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2010 年 12 月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将考虑参加 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项目,根据签署的框架协议,该项目由亚洲开发银行的古丝绸之路天

然气运输项目资助。由此看来，印俄能源联系在未来会不断加强，双方在能源合作领域会出现更多的联系。

除石油和天然气外，俄罗斯与印度在能源联系方面还有铀和核能的合作。印俄核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苏联解体之前两国于 1988 年签署了核合作协议，1998 年进行重新协商并签署了拓展其他方面核合作的协议。如 2002 年俄罗斯在印度库丹库拉姆（Kudankulam），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建造两座核反应堆的协议。当然，印俄之间恢复能源对话始于核能领域，印俄之间最先开始的核能能源对话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但在现在看来，印俄之间的核能合作在逐渐去政治化影响，民用核能合作在两国之间逐渐展开。自 2008 年俄罗斯参与印度联合开发核项目以来，印俄等在库丹库拉姆以建造四座额外的核反应堆，双方还在核工程师培训方面开展合作以加强双方核领域合作联系。2010 年俄罗斯总理普京访问印度期间，双方扩大了合作协议并制定了未来合作计划路线图，计划未来 15 年内将在印度建造 16 个核电机组。在扩大和印度开展民用核能开发合作的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强与南亚其他国家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但都相对兼顾到印度的利益。2018 年 3 月，印度、俄罗斯、孟加拉三国在新德里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印度核能合作公司（Nuclear Power Cooperation of India Limited (NPCIL)）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负责提供设备和原材料，俄罗斯负责设施建设。

政治互信、军事防务合作以及能源合作可以说是印俄关系发展的三大基石，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有着良好深厚的合作传统，新世纪以来两国在传统合作领域更是日渐深化和加强。

基于上述分析，印俄之间的多渠道联系的三个方面不仅表现出了印俄政府精英之间的正式安排与联系，也表现出了跨国组织（如跨国公司、多国银行）在印俄联系渠道之间的作用。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看来，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外交议程（政府所关注的一系列与对外政策相关的问题）变得更为广泛、更具多元化。印俄之间亦是如此。

## （二）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

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所认为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外交议程更为广泛多元越加符合现实世界。除具有传统合作基础的政治、军事防务、军事装备和能源领域之外，印俄之间也在贸易和投资、科技合作、文化和教育之间开展积极的合作。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印俄之间的合作议题更是多元化发展，呈

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

印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一直以来都是短板之一，印俄贸易远小于同期的印美和中俄贸易。科技合作也是印俄之间合作的新兴领域，两国科技合作主要有半导体产品、超级计算机、疫苗工程、激光科学和技术以及地震科学等方面。此外，文化联系也在印俄之间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特别是自 2000 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文化关系中出台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无论是在传统的政治互信、军事防务以及能源合作，还是在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科技合作、文化教育等联系方面，印俄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并没有体现出等级之分、好坏之别。

### 1. 经贸合作，两国正在拓展的空间

与其它合作领域相比，印俄之间经贸合作相对较为逊色，但也存在小幅度的增长趋势。2017-2018 年印度总出口额为 3035.26 亿美元，向俄罗斯出口 21.13 亿美元，占其总出口额的 0.69%，而在 2018 年 4 月到 2019 年 1 月间，印度向俄罗斯出口 19.5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 2702.48 亿美元的 0.72%，较上一比较年度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除 2008-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印俄贸易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与印苏时期在 1985 年创下的双边贸易（进口和出口）最高峰 60 亿美元相比，印俄在 90 年代后期和 21 世纪前十年也没有超越这一历史记录，直到 2011 年印俄双边贸易接近 90 亿美元，这一历史记录才被超越。

尽管印俄双边经贸投资相对于其主要的贸易投资国所占比重很小，但是两国政府之间、领导人之间有着很强的雄心促进他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发展。2010 年，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印度期间，考虑到印俄两国经济体规模，两国都有意识进一步增加双边贸易和投资，双方决定设定 200 亿美元的贸易投资目标。为促进贸易联系，印俄两国还积极邀请第三国加入，共同带动和促进双多边贸易发展。2012 年 7 月，印俄同意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共同参与研究一项全面经济合作协议，并表示有信心在 2015 年前实现 200 亿美元的贸易目标。两国在双边贸易投资领域还有着更大的雄心，在 2017 年印俄建交 70 周年之际，双方商定将两国双边贸易再提升一个新台阶。2017 年 4 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其主持的首次印俄媒体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一个更具雄心的目标，即到 2025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300 亿美元。同年 11 月，印俄还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上发表了振兴

印度俄罗斯双边贸易的声明，提出除军事防务装备的传统贸易领域外还将在药物制造、农产品加工、汽车零配件、采矿业和冶金工业等领域扩大双边合作。对于印俄贸易的现状，两国都认为远未达到实际水平，还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2018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非正式会晤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扩大印俄双边经济的合作领域。双方将物流、基础设施、知识型经济、钻石和黄金等列为重点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双方讨论了在那格浦尔（Nagpur）与塞康德拉巴德（Secunderabad）之间的高速铁路沿线的联合研究开展情况。

此外，俄罗斯与印度的经贸关系还表现在一方积极支持另一方加入区域或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以第三方为依托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印俄作为金砖成员国，双方以金砖机制为平台，在金砖框架下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另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APEC)）作为一个多边性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论坛，印度一直对成为该组织论坛的成员抱有极大的兴趣，而俄罗斯也极力地支持和促进印度加入。

从印俄关系的整体来看，双边经贸关系当前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在近几年来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到了加强，未来印俄经贸关系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 2.科技合作，双边联系的延伸

当今世界的竞争趋势主要体现为科技的竞争，各国对科技贸易、科技投资、技术转让都严格控制，对技术部门的投资也被看作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中国—欧盟：战略前景》中就有显著的体现，其中提到：外国对欧盟战略部门的投资、对欧盟关键资产、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收购、参与欧盟标准制定以及关键设备的供应，都可能对欧盟的安全构成危险。但在印俄科技合作中，关于构成安全危险几乎很少提及，反而两国在科技和领域大有“强势进军”的态势。印俄科技合作充满潜力和希望，并且两国都有意愿继续扩大其合作领域。

印（苏）俄科技合作有着较长的历史，两国最早于1987年签署印苏综合长期计划项目（Integrated Long-Term Program(ILTP)），1994年印俄两国对该计划进行更新并于2010年再次签署延长计划，ILTP计划是印度与外国签订的最大的双边科技合作计划。ILTP计划由印度科学和技术部以及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工业和科学技术部协调开展，涉及半导体产品、超级计算机、多种疫苗、激光科学和技术、地震学、高纯度材料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开发等领域。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非政府层面，印俄在新世纪以来一直积极推动科技合作。2005年，印度科技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与俄罗斯基础科学研究基金会



(Russian Foundation of Basic Research) 签署谅解备忘录，莫斯科于 2007 年开始开展科学合作并于 2010 年达成一系列涉及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服务、药品和生物制药领域建立合资企业和技术交流机制、灾害预测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联合创建肿瘤医学、以及其他高科技联合研发的促进两国企业合作的协议。此外，两国的科技合作还涉及太空领域。俄罗斯联邦航天局(Russian Federal Space Agency (RFSA, or Roskosmos)) 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zation(ISRO)) 是两国开展空间合作的主要力量。

尽管印俄之间的科技合作也是双方联系的渠道之一，但这一渠道还处在发展之中，很多还是未开发领域，如联合医学研究等。不过，两国政府和企业都对双方的科技合作予以重视，并且正处于不断加强的过程中。

### 3. “软力量”联系，文化教育合作

就印俄相互关系而言，文化教育联系与合作是最为薄弱的方面，但是两国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团体组织都对文化教育的“软力量”合作正在贡献力量，与其他诸如军事防务合作、能源合作等方面处于同等地位。2000 年签署的《印度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加强两国文化联系与合作的条款，指出：两国将进一步推动文化合作并且相互间广泛接触对方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成就；促进两国人民、组织团体在文化、教育、媒体、青年一代和体育项目领域的繁荣活跃。

自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文化联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举措。如印度的俄罗斯文化（2003 年）和俄罗斯的印度文化日（2005 年），印度的俄罗斯年（2008 年）和俄罗斯的印度年（2009 年）等，双方都以娱乐为特色的装饰艺术进行了展览。2011 年，在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端的印度喜马偕尔邦 (Himachal Pradesh) 的库鲁山谷里，两国共同建立了洛瑞克 (Roerichs) 国际艺术学院。尼古拉斯·洛瑞克 (Nicholas Roerich) 是原俄罗斯艺术家，1927 年从圣彼得堡来到这里并定居。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尼古拉·里沙托维奇·库达谢夫 (Nikolay Rishatovich Kudashev) 认为印俄之间的关系也包含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其本人于 2018 年 4 月访问了洛瑞克国际艺术学院。除官方的文化合作外，印俄两国民间组织、团体也在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不断努力。2019 年 2 月 18 日，俄罗斯国际合作协会 (Russi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AIC)) 与印度友谊协会 (Friendship Society of India) 以及印度-俄罗斯基金会 (India-Russia Foundation) 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协议旨在促进俄罗斯与印度之间的文化关系。

近年来，印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在蓬勃兴起，为两国多渠道联系提供有力支撑。在印俄共同重视下，文化交流与合作也变得越加重要，未来在两国联系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印俄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以及外交议程中的经贸合作、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合作等都得到了两国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是印俄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

如果每个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都极其严峻，则由经济和其他资源支撑的军事力量将成为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当然，这是在没有政府状态下的现实境遇，也是理论上的前提假设。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使得攻击任何有核国家都极其危险，因此核武器基本用于威慑。对于印度和俄罗斯而言，两国都是有核国家，因此在该理论前提下两国发动战争都是极其危险的。更何况印俄两国无论是在战略利益还是在边界等问题上都无直接的冲突，两国发生军事纠葛的可能性更是减小。印度在拥核之路上曾向苏联寻求结盟，希望苏联向印度提供核保护伞，但是由于苏联与印度在利益关切上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为取得实质性效果。但俄罗斯在印度拥核问题上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印俄之间战争与威慑问题难以成立。最为重要的是，印度俄罗斯之间于1993年签署的《印度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友好合作条约》作为1971年印苏签订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延续，在印俄2000年伙伴关系宣言中得到了重申。

相反，印俄之间不但在军事力量对抗方面起着次要作用，反而在军事合作领域加强合作，并且在很多关键军事技术领域有着长期的、深入的合作。如在前“防务合作”一节中所述，印俄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已成为两国之间的“强力纽带”。在复合相互依赖的印俄关系中，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甚至是“负反向”作用。两国在军事方面长期开展的合作与联系更使两国具有相互依赖性，特别是在当前印俄不断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以及联合研发、生产的情况下。印俄军事合作、防务合作促进的是两国军事力量相互依赖的加强，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对立。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第三个特征来看，军事力量在印俄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起到的是“负反向”作用，促使的是两国关系的加强而非对抗或威慑。

综合上述分析，苏联解体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印俄关系在政治、军事、能源、科技、经贸、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建立了多渠道联系，且双方的联系中都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重视以及部分领域也在民间团体组织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尽管

印俄关系在多领域的联系策略得到体现，但是还存在部分的不足之处，不过这不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内。总体看来，印俄关系在上述领域中加强了相互依赖，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四、结语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符合相互依赖是一种理想模式，对现实世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话说，复合相互依赖在更多情况下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印俄关系，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较好地说明了两国之间在政治、军事、能源、科技、经贸、文化和教育之间的多渠道且没有体现出等级之分的联系。尽管当前在经贸、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联系还不够像其他领域那样紧密，但在印俄之间的政府交往、首脑交往以及民间组织团体之间，薄弱领域得到有益的补充。军事力量在印俄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或威慑，较复合依赖理论所提出次级力量作用还应处于更次级的地位，因为军事合作是印俄军事合作中的传统领域，有着长期的深入的合作。

印度和俄罗斯作为金砖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区域机制内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增强其传统友谊以及稳定地区秩序和促进地区和平，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做出积极贡献。印度和俄罗斯作为我国周边地区大国，对我国周边地区安全和周边外交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印俄之间的良好合作传统也为我国提供了一定的机遇，特别是在印度与我国还存在一定误解的领域，俄罗斯可以充分发挥印俄良好关系的作用减少中印误判。总之，印俄关系的良好发展对于我国开展周边外交有利而无害。

# 帝国历史记忆对俄罗斯的影响

## ——以克里米亚事件为例

张子琰（我院 2018 级硕士，此文由我院国际关系历史与专题课程教师潘兴明推荐刊发）

### 引言

《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中这样写道：“帝国不会没有痕迹地消失……帝国将文化、政治、经济甚至社会遗产留给人们，既会引起谴责，也同样会收获悼念。”如果我们采用俄罗斯科学院彼得罗夫对帝国的定义：“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具有民族多样性、宗教信仰多样性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性等特征。帝国将从前独立的国家并入到自己的版图中，并在帝国疆域内积极推行帝国政策。”，那么帝国的历史记忆往往与专制、扩张、辐射影响力等因素有关。这种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人民。这些记忆有其深刻的地缘和历史文化基础，对这些国家当今的决策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帝国历史记忆反应了一个国家和其人民的史观，体现在现代国家的决策行为中。这种历史记忆可能会成为一种传统作风，留下长远的奋斗目标；帝国曾经走过的弯路，至今未解决，甚至继续发酵的纠葛难题，仍在影响着当代的国际关系；而曾经的辉煌也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煽动民族情绪的有力手段。例如，大英帝国曾以工业革命，商业贸易“起家”，以老牌资本主义自居，至今仍在全球金融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他们在欧盟中的种种表现，例如不愿加入欧元区，坚持使用本国货币英镑，直至今天“顺应民意”做出“脱欧”决定，坚持国家的经济独立，正是受了帝国历史记忆的影响。大英帝国作为曾经掠夺殖民的实施者，在其他国家“非殖民化”的进程中，仍需兼顾各民族国家的动向。

俄罗斯也是一个拥有“帝国历史记忆”的国家。18 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开拓疆土，将俄罗斯带入欧洲列强之列。无论是俄罗斯帝国（1721-1917）还是苏联（1917-1991），都以广袤的国土、多元的民族、庞大的体量著称，长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当今的俄罗斯也是如此。

2014 年 2 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克里米亚通过“公投”的方式并入俄罗斯联邦，而这一年，距沙俄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

已有 231 周年。很多西方国家将包括俄罗斯 2008 年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视为“新帝国主义”的体现。澳大利亚学者波波·罗 (Bobo Lo) 在《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中认为，普京致力于“‘聚集俄罗斯土地’，重申莫斯科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霸权”。波兰拉扎尔斯基大学的奥斯塔普·库尔什尔 (Ostap Kurshir)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分道扬镳》一书中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积怨有其历史根源，俄罗斯仍以“帝国”自居，颐指气使，而乌克兰在“后殖民时代”艰难探索。

而俄罗斯国内却认为，此举具有相当的合法性。2014 年 3 月 18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演说，从克里米亚的历史意义、克里米亚的经济、政治现状和外部国际环境等方面为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重大意义做了阐释。本文希望通过对俄罗斯帝国思想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对俄罗斯帝国与克里米亚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寻找当今俄罗斯一些决策行为的历史根源。

## 一、俄罗斯帝国思想沿革

肩负“第三罗马”的宗教使命，拥有广阔的平原大陆资源，经受寒冷气候的磨练，俄罗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下逐渐成长。经历过国内的“混沌时期”，也经历过蒙古金帐汗国的高压统治，终于在俄罗斯彼得大帝即位以后迎来了崛起。1721 年俄罗斯帝国形成以来，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落。近一百年，更是经历了两次巨变——一次是十月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次是 1991 年苏联解体，让俄罗斯再次站在了选择的岔路口上。俄罗斯的帝国传统思想也在不断地演进发展。

### (一) 俄罗斯帝国时期 (1721-1917)

19 世纪标志着俄罗斯帝国思想的鼎盛时期。俄罗斯学术辞典中这样定义俄罗斯的帝国思想 (имперская идея)：它是 19-20 世纪俄国社会思想的主流方向，主张国家的主导作用，为东正教献身和人民性 (народность)，强调中央集权与精神家园的力量。无论民族血统，无论信仰，无论语言，只要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具有公民身份，拥护帝国统治，既可“成为俄罗斯人”。俄罗斯帝国的俄统一建立在精神统一之上，让沙皇的权力即使是在边远地区，仍具有生命力。

在对外交往方面，俄罗斯的重心放在西方，与各国合纵连横。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感情非常矛盾，一方面，以彼得大帝为尊的西欧派对西方的技术和文明十分仰慕，努力融入。另一方面，着眼于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团结的斯拉夫派觉得自己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肩负神圣使命。基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俄罗斯人从未

停止过关于自己属于欧洲还是属于亚洲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也是哲学层面的。别尔嘉耶夫就曾经著《俄罗斯的精神》一书来探讨俄罗斯作为“双头鹰”的民族性。但是无论如何，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远大于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而且，由于历史上的长期隔绝和宗教差异，俄罗斯也很少得到欧洲国家的认同，这也对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我定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俄罗斯的帝国性表现在积极的领土扩张，寻找出海口上。不同于英国、荷兰、西班牙等海洋实力出众的西欧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大陆帝国，它的地理位置对自身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一直非常希望拥有出海口。芬兰、巴尔干地区、土耳其海峡都是其觊觎的对象。俄罗斯与清朝在黑龙江流域的两次冲突，也是为了夺取太平洋出海口。除此之外，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足迹还遍布北高加索、中亚地区、远东地区。俄罗斯的领土由莫斯科公国伊凡三世时期的 43 万平方公里扩张到了惊人的 2180.0251 万平方千米。俄罗斯帝国领土的扩张呈现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周边膨胀的特点。这一点也与远渡重洋，开辟海外殖民地的英帝国等有所不同。

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其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发展不平衡。亚历山大三世曾经说：“俄罗斯只有两个可靠的朋友：陆军和海军。由于曾经饱受蒙古铁蹄蹂躏，俄罗斯总是带有一种警惕性和危机感，为可能到来的战斗做好军事准备，必要时短兵相接。但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不相称还是会造成一定的问题。虽然俄罗斯的农业，例如小麦和棉花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工业起步较晚，19 世纪 30 年代，英法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俄罗斯的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而且一直都没有形成有力的产业链。虽然国土辽阔，体量庞大，但是国内矛盾重重。一战前夕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暴露出了俄罗斯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实力落后，没有经济支撑的弊端。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然而，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政策缺乏连贯性。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强迫其他民族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官方民族主义”和提倡民族融合的“泛斯拉夫主义”等不同流派。无论如何，“伟大的精神使命”、“全人类的俄罗斯心灵”、用东正教“清洁世界”等思想一直都是帝国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统治的重要精神手段。东正教提倡的救赎、苦难的力量、自我反省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沉重的一面，也赋予了他们神圣的使命感，在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昊琦在《俄罗斯帝国思想初探》总结：“在俄罗斯统一过程中形成的大俄

罗斯意识成为其帝国思想的心理基础，在内外斗争中奉行的权利政治观念则是其行动的逻辑，并且在俄罗斯的帝国思想中由有限的地区性蚕食思想发展为世界性征服思想。”俄罗斯帝国最光辉的时刻之一，就是在整个欧洲都匍匐于拿破仑脚下时，成功击败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率领军队通过法国凯旋门之时了。在 1821 年的战争中，俄罗斯人的表现充满了传奇色彩。当拿破仑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他们宁愿自己放火焚烧莫斯科城，最后在本国自然气候条件的帮助下一路反攻。纵观这一时期，俄罗斯在重大的战役中都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俄罗斯帝国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无可取代，耐人寻味。

## （二）苏联时期（1917-1991）

苏联刚建立初期，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也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但在后期，仍然表现出了帝国的扩张性和控制欲，试图在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对周边国家投射其影响力，并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因此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并没有完全完成对帝国的清算，只是暂时削弱了帝国。

国内的民族政策上，苏联的做法较为简单粗暴。苏联简单地用人民所在的边界分离族群，并且对每个加盟国在“社会主义生产线”上所发挥的作用做了分工。这导致苏联解体后，有一些重要资源，例如乌克兰的黑海舰队，哈萨克斯坦的航空航天发射场，一夜之间都成了一盘散沙。苏联的民族政策没有真正推动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苏联民族”的形成，反而使国内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分崩离析。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国家，苏联曾经信奉平等的“国际主义”，初衷是工人和工人之间的联合。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差异，这种“国际主义”逐渐变质成为“大国主义”。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就包含了很多领导和主宰的意味。譬如，“大国责任论”强调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家长中的地位，“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利益阵营的限制。阿富汗战争也是苏联试图扩散影响力，不惜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例子，这样公然漠视别的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行为也遭到了很多指责。可以看出，随着 20 世纪主权国家的觉醒，“去殖民化”浪潮的发展，帝国的一些强硬扩张已经不再被时代所容。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是受到了来自美国阵营的竞争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反抗的双重压力。

苏联时期，俄罗斯同样成功地抵挡了一次入侵，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称这场战争为“伟大卫国战争”。直到今天，每到 5 月 9 日胜利日，各地都

会举行各种庆典。苏联同样也留下许多伤痛记忆，白俄罗斯女作家，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就聚焦了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等事件。应该如何总结苏联的得与失，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 （三）当代俄罗斯（1991-至今）

波波·罗认为，现代俄罗斯帝国的思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利意识。其次，表现在俄罗斯认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应把后苏联空间视为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的世界的一部分。第三，俄罗斯把后苏联空间作为缓冲区这种想法带有明显的帝国思维。第四，帝国思维隐含强烈的文化认同。最后，不以领土范围或传统意义上的力量投射，而是以经济影响力来定义帝国，也是一种帝国思维。对于与俄罗斯拥有部分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周边国家，俄罗斯似乎仍有一种“使命感”，对于他们的“传统势力范围”，他们总是试图维护自己曾经的影响力。

当代俄罗斯以亚历山大·杜金为代表的“大欧亚”概念，界定了俄罗斯当前的战略选择。欧亚概念在18世纪便已出现，苏联解体后，组建独联体时又被重新提起，在实践上经历了独联体、欧亚共同体到欧亚经济联盟的演进。与1855年俄罗斯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转而进军中亚，转移国内矛盾非常相似——在与欧洲打交道的过程中碰壁了以后，俄罗斯会把目光投向东方。有西方学者认为，如今的欧亚经济联盟标志俄罗斯精英旨在创建一个“边界清晰的排他性空间”。但俄国内则认为，大欧亚战略只是一个面对西方文明的地缘政治扩张以及压力寻求最佳生存战略。俄罗斯积极参加金砖五国，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国际组织，是一种包容的表现。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曾实施完全的倒向西方的政策，但是结果却非常不理想。如今，北约的东扩，欧盟的扩张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布施自己的影响等动作，都触动着俄罗斯敏感的神经。俄罗斯实现自己的各种理想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心中仍有“愈挫愈奋”的精神支撑，对于复兴国家的愿景心向往之，以力图之。

## 二、俄罗斯帝国历史记忆的当代体现：以克里米亚战争为例

### （一）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克里米亚神话”

在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前，俄罗斯就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交战多年，克里米亚



汗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附属国，成为了俄国南部边境的一个不稳定的据点。在俄罗斯陆续击败瑞典和波兰，西欧普鲁士、奥地利、法国、英国都忙着解决自己的边界问题、国内革命问题和扩张问题时，叶卡捷琳娜大帝瞄准这个时机制定了“希腊计划”，企图与奥地利联手出兵攻打奥斯曼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土地上恢复拜占庭时期的东正教国家。后来，由于奥地利的退出，“希腊计划”改变为“克里米亚计划”。

叶卡捷琳娜大帝曾亲自到访克里米亚六个月，在岛上进行了实地考察。作陪的谢久尔伯爵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黑海边的克里米亚的重要战略地位：“突然，一扇大门打开了，我们的眼前一派荣耀景象：在两排鞑靼骑兵之间，我们看到一个十二乘四俄里的宽阔的海湾。若是能在这离首都圣彼得堡两千俄里的地方建立一支威严的舰队，在这样的边疆建造城市，安置居民，筑起堡垒，那真是一项壮举！”

俄土战争从 1744 年持续到 1768 年。俄罗斯人与土耳其军队与当地的克里米亚汗国展开了周旋。夺取克里米亚的过程虽然缓慢，但是还是以胜利告终。叶卡捷琳娜大帝出兵攻占克里米亚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军事战略考量。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为俄罗斯在黑海沿岸展开活动开辟了新的天地。从此以后克里米亚迎来了大量的移民，开展了堡垒和工事的建筑，逐渐发展成为黑海沿岸的坚固要塞。

## （二）1855 年克里米亚战争：屈辱与光荣

1821 年俄罗斯击败拿破仑后，“俄罗斯威胁论”引起了西欧各国的担忧。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和经过盘根错节，政治和信仰紧紧纠缠。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既有基督教、东正教、穆斯林的宗教纷争，也有西欧各国扩大影响力、占领市场、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鼓动的各种动机。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了惨痛的损失。战争中牺牲了七十五万军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俄罗斯军人。1855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是 17 世纪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向土耳其人割让了领土。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俄罗斯因此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觉得这些基督教国家竟然会背叛自己，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这场战争暴露了俄国国内的许多问题，为今后的农奴制改革乃至十月革命埋下了伏笔。

这样的损失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场不愉快的记忆，但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卫者，俄罗斯人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觉得他们做出的牺牲以及为宗教信仰而战的

动机成为了一种道义上的胜利。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中就充满了对俄罗斯人英勇无畏的赞颂：“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将长存与俄罗斯的记忆中，其主角便是俄罗斯人民”。保守派和宗教领袖们也将其描绘为一场圣战，俄罗斯参展是因为肩负着上天授予的捍卫东征教的使命。这样，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忆被提高到了一个神话般的高度，成为了一段难以释怀的历史。

### （三）英雄城塞瓦斯托波尔

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二战 13 座英雄城市之一，也是 1965 年第一批被授予该称号的城市中的一员。作为俄罗斯在黑海的门户，塞瓦斯托波尔在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从 1941 年 10 月 30 日持续到 1942 年 7 月 2 日，黑海舰队、滨海边疆军和城市人口为保卫塞瓦斯托波尔主要海军基地而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争夺塞瓦斯托波尔的斗争中，法西斯军队伤亡 30 万人，苏联军队则损失了大约 15.7 万人。虽然塞瓦斯托波尔最终陷落，但是滨海边疆军的士兵和黑海舰队的水手表现出巨大的英雄气概和韧性。超过一万五千名塞瓦斯托波尔人加入了民兵组织，参与建造防御工事，为前线制造武器和弹药以及救助伤兵，在德军已形成合围之势的情况下仍坚守 250 多天，牵制了德军的力量，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克里米亚入俄以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也建设了一些与二战有关的纪念地，如胜利公园的祖国捍卫者纪念碑和防御解放英雄纪念碑。

### （四）帝国历史记忆与当代克里米亚入俄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克里米亚对与俄罗斯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战略意义。2018 年 3 月 18 日，普京就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发表演讲。他认为，苏联的解体突然将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分裂，让生活在克里米亚的 150 万俄罗斯人（克里米亚岛上居民人口为 220 万）成为了“少数民族”，当时的俄罗斯面对艰难的国内形势，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面对现今克里米亚半岛上俄罗斯历史遗迹不断被毁坏，俄语即将被同化，人民的合法利益和改革诉求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俄罗斯必须做出反应，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顺应当地的民意。他也用民调来证明整个国家对克里米亚的情感：“95%的俄罗斯公民认为，我们应当保护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利益。超过 83%的人民认为，即使俄罗斯会因此付出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代价，也在所不惜。86%的民众相信，克里米亚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土地。”

如今，距克里米亚入俄已有五年，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军事与经济基础设施

建设稳步开展。黑海舰队的训练紧锣密鼓地展开，在克里米亚地区建立自由经贸区也提上日程。若说克里米亚入俄是出于纯粹的民族情感，似乎有些片面。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仍然体现了寻求扩张，收回传统势力范围，寻找出海口的战略考量，并且以精神上的救赎意识作为一个对自己行为出发点“合法性”的解释。

虽然自克里米亚入俄以后，俄罗斯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国内经济形势愈发艰难，但是历史上俄罗斯习惯于各种摩擦与争端，外界环境的复杂并不能削减俄罗斯的决心。政府没有消沉，普通民众也是如此。俄罗斯列瓦达分析中心（Levada Analytical Center）2019年4月发布的民意调研显示，2019年“坚决支持”克里米亚入俄的民众占58%，“大部分支持”的民众占28%，5%的民众表示“很难说”，仅有3%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俄罗斯政府此举的人数比例在缓缓上升。民调也显示，大部分俄罗斯民众认识到为了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身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对俄罗斯造成的冲击，如经济衰退（58%），生活水平下降（64%），与美国关系恶化（64%）等，但是，大部分民众仍然认为俄罗斯的进步也十分明显，包括军事防御力量的增长（83%），国际影响力的上升（62%）。70%的民众仍然认为俄罗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对国家发展大有裨益。这样贯穿于决策层和民众的极高的“心气”，表现出了俄罗斯上下不畏困难，坚持自己的目标的决心。

### 三、“孤独的混血儿”与“孤独的帝国”

俄罗斯帝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地理上，它幅员辽阔，却囿于大陆；思想传统上，它背负东正教的十字架艰难前行。苏尔科夫这样描述俄罗斯：“她是东西方的混血儿国家。它有着双头体制，混合的民族精神，跨洲的领土和双重历史。正如混血儿一样，它魅力十足，多才多艺，美貌而孤寂。”了解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了解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对于我们理解与判断俄罗斯的决策，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当今社会，“帝国”已成了一个贬义词，几乎不再出现在任何官方的说辞中，但是帝国留下的作风和思想仍然存在俄罗斯的思维模式中，主要表现在战略目标的选择上和提供精神支柱，提高国内凝聚力上。俄罗斯是否还有为完成的“帝国梦”？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据普京在2018年的国情咨询文中的统计数据，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丧失了23.8%的领土、48.5%的人口、41%的国民生产总值、39.4%的工业生产能力。对于这样的差距，俄罗斯一方面发展国内经济生产，另一方面仍然热心国际事务，在很多问题上绝不袖手旁观。

俄罗斯现在还有能源、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等筹码。但是俄罗斯这样的行事方式，也会给周边国家带来恐惧，波兰和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尤为消极。例如，在天然气输送管道建设方面，波兰非常害怕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而失去一定的自主性，甚至不顾经济成本，首先追求政治和安全的利益，积极与美国等国家商谈。周边国家的恐惧心理客观上也给了美国等国家介入的机会，对俄罗斯的周边形势带来更严峻的考验。

在了解了俄罗斯决策的一些历史根源，了解这样的救赎意识和帝国雄心不会简单地被抹去以后，与俄罗斯打交道的过程中，应当意识到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也很缺乏安全感的国家。在对俄罗斯的情感做出适当关切的同时，也需要对俄罗斯的“野心”有所准备，做到张弛有度。

米·莱蒙托夫曾有诗云：“一座神庙，虽然荒芜，仍然是神庙；一座祭坛，即使坍塌，依然是神。”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以这样的一个“孤独的混血儿”的形态，怀抱着历史留给自己的精神遗产，在自己的道路上踽踽而行。俄罗斯会应验“受地缘政治驱动的围剿政策可能会失去吸引力，对那些成长于军事实力、现实政治和伟大国家为背景的精英也是如此”的判断，还是终将能够“将历史的独特传统与现实的国际形势结合起来，超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对峙”，取决于俄罗斯今后的道路选择。若能铭记历史，化为历史记忆动力，与时俱进，并且充分尊重现代国际社会的法律和周边国家的自由意志，俄罗斯的独特性或许能够为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自己的范式。

# 从三个变量的角度看日本反美情绪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及生效的“无能为力”

余抒芮（我院 2018 级硕士，此文由我院国际关系历史与专题课程教师潘兴明推荐刊发）

## 绪论

1960 年 1 月，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与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通称新《日美安保条约》，该条约于 1960 年 6 月 23 日正式生效。与 1951 年签订的旧《日美安保条约》相比，新条约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日关系的平等性，但仍然损害了日本的国家主权。此外，新条约规定美军可使用日本提供的军事基地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而这里的“远东”区域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地区等亚洲“火药桶”，大大增加了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再加上对驻日美军基地核武器化的担心，日本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抗议运动，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主张完全废除《日美安保条约》。

从 1959 年 3 月到 1960 年 6 月条约正式生效，约有 2000 万日本人参与到抗议运动之中。但这种空前高涨的反美情绪虽然迫使岸信介辞职、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行程，却未能成功阻止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及生效。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中将民众的需求与支持所构成的政治输入形容成政府决策，也就是政治输出的依据与基石。政府决策必须回应民众的需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对欧洲走向一体化过程中民意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时提出：“在 4 个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国家中……甚至在英国，民众的观点最终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日本作为代议制民主国家，为什么其国内民众针对新《日美安保条约》所爆发出的反美情绪没有对该条约的签订及生效产生重大影响？是什么造成了 1960 年日本反美情绪的“无能为力”？本文在第一部分简单阐述目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研究重点，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在第二部分尝试以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决定民意对决策影响力的三个变量——技能、价值和结构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框架，对日本反美情绪未能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原因做出假设；在第三部分通过史料验证假设，最后得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 一、已有研究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研究重点

国内学者似乎主要将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其本身的缘由、过程、意义及其对以美日关系为首的亚洲国际关系、日本此后的发展、美国对日政策之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对在这一事件中重要历史人物、机构（比如日本首相岸信介、日本共党）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学者做出评析。比如崔丕所写的《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新论，使用详实的史料及条约原文说明美日双方在新《日美安保条约》上所体现的战略利益之差异与汇合。张健所写《从“安保条约”的修改看日美关系的演变》，论述了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由来、岸信介内阁在条约签订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后评价了条约签订对日美关系产生的影响，称该条约的签订是日美关系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的重要一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环，更是日本在日美同盟前提下追求独立的唯一选择。但这些研究中尽管提到了日本民众对条约签订所爆发除了不满，却只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或只做了描述性的评价，并未对其为什么没有动摇条约的签订与生效做进一步解释与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日美安保条约》及日本民众爆发的反美情绪进行了诸多深入全面的研究，但涉及反美情绪对条约本身之作用的研究好像还不够充分。杨洪超在其硕士论文《“安保斗争”及其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1960-1964)》中提到，美国学者站在美国的视角探究了日本民众爆发反美情绪的原因，比如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将日本的反美情绪归因于美国不够充分了解日本民众，尤其是反对派的想法。还有一些学者对日本反美群众运动的详细经过及其对美日关系所造成的冲击做了研究。而日本国内学者除了“回忆录”性质的描述性著作外，还较为缺乏学术性的专著研究。杨洪超本人将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研究重点放在日本群众的反美情绪对之后日本的内政外交所产生的影响上。

本文尝试将焦点转向条约签订当时（1959-1960）的日本国内，以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技能、价值和结构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框架，探寻日本反美情绪在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过程中表现得“无能为力”的原因，希望能够丰富该条约相关研究结果。

## 二、决定民意对政府决策影响力的三个变量及对日本的假设

英格尔哈特在研究欧洲走向一体化过程中民意所发挥的作用时明确提出，民意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第一，民众的政治技能。短期来看，重要的是民众对特定问题的知晓及觉醒程度。长期来看，重要的是民众中有多少是拥有熟练政治技能的参政者。教育水平的提升及大众传媒的发展（会增加民众了解的信息）能提高民众的政治技能。第二，价值。如果特定问题仅涉及民众的表面偏好，政治精英可以较容易地左右民众。但如果这个问题挑战到民众根深蒂固的价值，精英就只能缓慢而艰难地改变民众的想法，很多时候只能屈服于民意。第三，政治结构。个人的技能和价值受到宏观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制约。如果政治结构趋向多元化，民众可从党派竞争中获得发挥重要影响的空间。但如果政治结构趋向一元，民意的影响则可能很小。英格尔哈特还针对欧洲一体化提出超国家政治结构的重要性，长时间受到欧洲政治机构管辖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对欧洲有更高的认同感。

如果这决定民意对政府决策影响力的三个变量及其相互作用理论对新《日美安保公约》签订时期的日本也适用，那么可以为解释当时日本的反美情绪为什么未能成功阻止条约的签订及生效这一史实提出以下几个假设：技能：a 日本民众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知晓及觉醒程度不足。b 直到 1960 年，日本民众中训练有素的参政者仍然较少；价值：c 新《日美安保条约》不挑战日本民众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结构：d 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趋向一元。e 日本此前长时间处在一个被美国管辖的政治环境中。推测当时的日本应该满足（技能与价值不满足时至少应满足结构相关的）以上假设。

由此，下一部分将结合史实检验这些假设，考察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是如何使日本的反美情绪显得“无能为力”的。

### （一）检验假设：技能

#### 1. 日本民众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知晓及觉醒程度不足

1959 年至 1960 年，日本三大报纸《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以及《朝日新闻》分别针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做了民意调查。

1959 年 9 月《读卖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对于“您认为新《日美安保条约》是否必要？如果必要您对政府的修改方案是否感到满意”这一提问，有 46% 的受访者认为必要，42% 的受访者不知道是否必要，仅有 12% 的受访者认为不必要。认为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是必要的这 46% 的受访者中，有 21%

的受访者完全不知道政府的修改方案是什么。而对于“您认为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是否会将日本卷入战争”这一提问，认为不会的受访者占全部受访者的39%，另有46%的受访者选择了“不知道”这一答案。

1960年1月《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中，认为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是好事的受访者占29%，认为不是好事的占25%，而持“无法回答、不知道”意见的达到40%之多。认为条约的签订恐怕会将日本卷入战争的受访者虽占到38%，但在这个问题回答“不清楚、不知道”的受访者也达到总受访者的34%。

条约签订后的1960年3月，《读卖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对于“国会是否应该承认新《日美安保条约》”这一提问，50%以上的受访者持“不知道、没有想法”的态度。《每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对于同一问题，虽有27.9%的受访者认为国会不应该承认，仍然有31.4%的受访者回答“不知道”，另有18.8%的受访者认为“国会不得不承认”。

条约生效后的1960年7月，《每日新闻》所做的调查中，对于条约的生效持“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态度的受访者最多，达到33.9%，持“不清楚不知道”态度的第二多，占全部受访者的26.6%。

可见，条约签订前，日本民众对条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抵触，而且相当多的民众对条约的具体内容和将会产生的影响知之甚少。而条约签订及生效后，日本民众虽然对其绝对不持有好感，但也不能说存在一种清晰的反对意见。大部分日本民众是困惑迷茫的，对条约的认知及觉醒程度明显不足。

2.直到1960年，日本民众中训练有素的参政者仍然较少

1960年前日本的参众议院选举相关数据如图1、图2所示。



图1 参议院议员选举 单位：(人、%)





图2 众议院议员选举 单位：(人、%)

1960年（即昭和35年）之前，日本参议院选举全国及地方投票率都经历了连续4次的下降，从1950年（即昭和25年）的72%降至1959年（即昭和34年）的58%。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相对稳定，但1960年的第29次选举投票率仍然比1958年（即昭和33年）的第28次选举降低了3%。日本国内民众参政热情并不高涨。

1959年日本民众学历水平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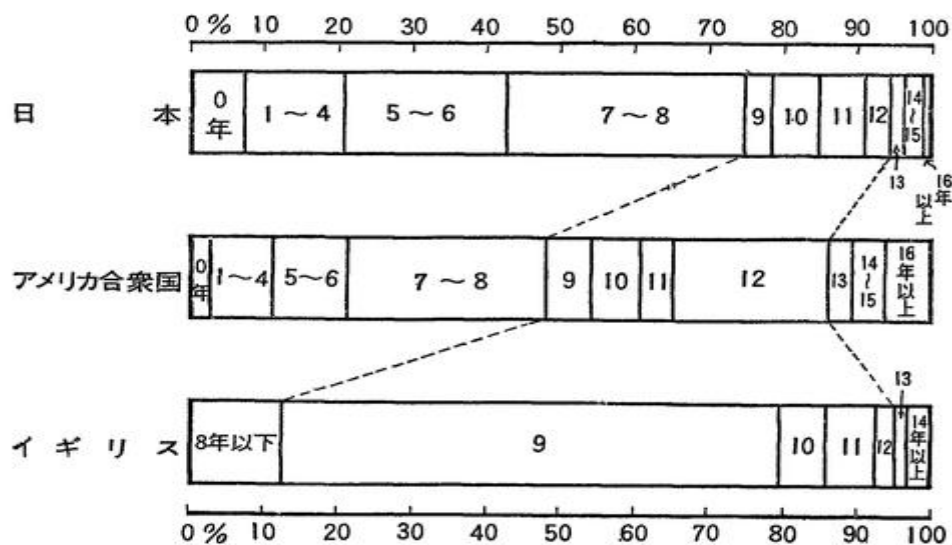


图3 1959年（昭和34年）日本民众学历水平与美国、英国比较

1959年日本只有不到30%的民众受过9年以上的学校教育，而在美国这一比例超过50%，在英国这一比例接近90%。日本1947年（昭和22年）开始才在全国推行9年义务教育，民众受教育水平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相比仍然较低。

1955年至1960年，日本的电视信号全国覆盖率虽然从36%扩大到了79%，但民众收看电视的时间并未大幅增加。1960年能接触到电视的人每天平均收看

时间仅为 2 小时零 8 分。1960 年（昭和 35 年）到 1985 年（昭和 60 年）日本民众余暇时间安排变化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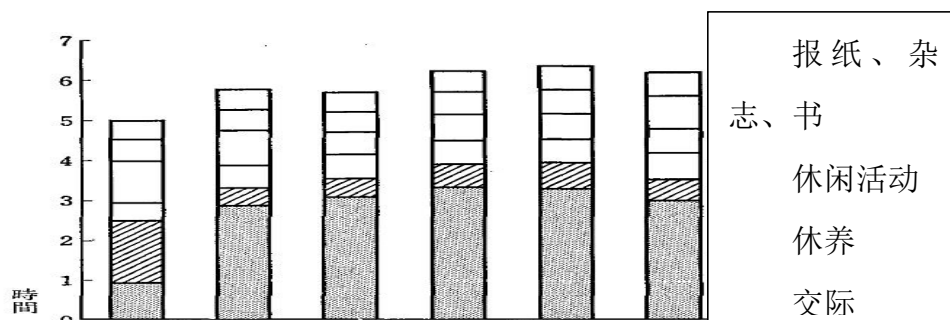


图 4 1960 年（昭和 35 年）到 1985 年（昭和 60 年）日本民众余暇时间安排变化（除双休日）

可见，直到 1960 年日本民众仍然主要依赖广播获取信息，电视尚未达到普及水准。日本现代化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才刚刚起步。

直到 1960 年，日本民众参政热情并不高涨，且民众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现代化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刚刚起步。日本民众中训练有素的参政者仍然较少。

## （二）检验假设：价值

### 1. 新《日美安保条约》不挑战日本民众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

根据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所做的民意调查，1953 年到 2003 年日本民众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之变化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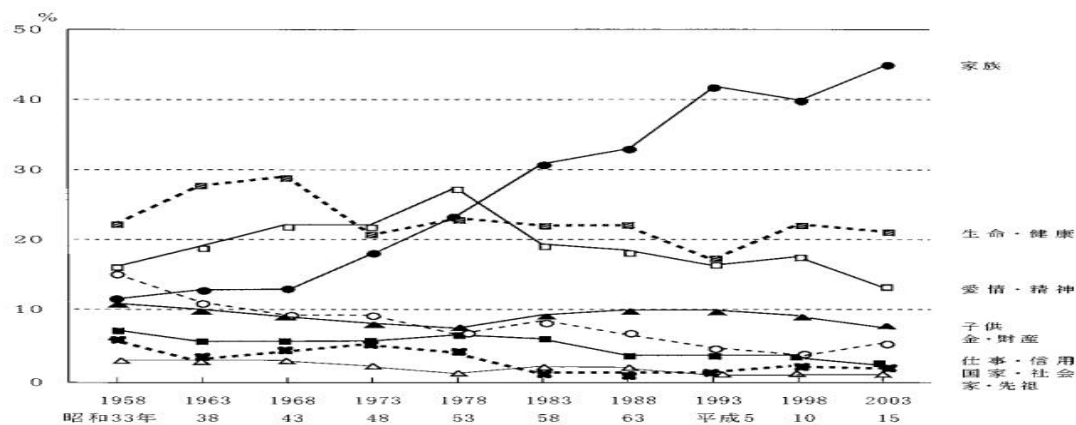


图 5 1953 年到 2003 年日本民众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之变化

1963 年之前，占压倒性优势被日本民众认为最重要的是生命和健康，其次是爱情和精神，然后是家庭、财产和孩子。这可以解释上文提到的日本三大报纸所做的民意调查中，“日本会不会因为新《日美安保条约》被卷入战争”这一问题的设置。事实上，在《读卖新闻》1959 年所做的民意调查中，仅有 15% 的受

访者认为日本会因为该条约被卷入战争。《朝日新闻》1960年1月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害怕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受访者增加到38%，可以说是预示了同年4、5月日本大规模反美游行的爆发。但两次民意调查中，不清楚该条约是否会加大日本战争威胁的民众也占据相当的比例（59年46%、60年34%），因此不能说新《日美安保条约》没有挑战日本民众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而是相当大一部分的民众没有意识到（或认识到）自己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已被挑战。

### （三）检验假设：结构

#### 1. 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趋向一元

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可用“一强多弱”来形容。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占据“一强”的地位，在日本“一党执政”长达38年之久。仅以众议院选举为例，1960年自民党议席率就达到63.38%。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及生效期间，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无疑更趋向于一元。

#### 2. 日本此前长时间处在一个被美国管辖的政治环境中

日本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新《日美安保条约》生效的1960年6月这段时间，可以说一直处于美国强有力的影响之下。52年之前，美日之间是一种“美君日臣”的不平等关系，虽然48年之后美国开始寻求与日本的合作可能性，但仍然是高高在上，“如同一国之君统治着日本”。1952年到条约签订的1960年，美日之间是一种“美主日从”的关系，日本虽然恢复了独立，但还是处处依赖美国，不论是经济、安全还是意识形态，无一不仰仗美国的扶持。因此说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前，日本长时间处在一个被美国管辖的政治环境中应该是较为符合事实的。

## 结论

1960年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当时的日本民众空前的反美情绪。但这种反美情绪虽然促使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辞职、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访日行程，却未能成功阻止该条约的签订及生效。作为代议制民主国家，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为何显得如此“无能为力”？目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研究虽然丰富，单独探究日本民众反美情绪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却似乎尚嫌不足。英格尔哈特在研究欧洲走向一体化过程中民意所发挥的作用时明确提出，民意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三个变量——技能、价值及结构的相互作用。如果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对日本也适用，可推出当时的日本应该满足（技能与价值不满足时至少满足结构相关的）以下几个假设。在

技能方面，日本民众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知晓及觉醒程度不足。直到 1960 年，日本民众中训练有素的参政者仍然较少；在价值方面，新《日美安保条约》不挑战日本民众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在结构方面，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趋向一元。日本此前长时间处在一个被美国管辖的政治环境中。

结合史实检验假设的结果，日本的情况都较为符合由英格尔哈特的三个变量之相互关系理论推导出来的 5 个假设。其中技能及结构方面的假设被证实，价值方面的假设应该用“日本民众没有意识到（或认识到）自己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被新《日美安保条约》挑战”替换。

由此可知，1959 至 1960 年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之所以没有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及生效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民众的政治技能不够纯熟、对政治价值及条约签订之间关联性的认识不深，且当时的日本政治体制趋向一元，此前又长时间受到美国的控制与影响。本文基于英格尔哈特理论所提出的假设仅为最初步、最基础的，可能不够周全。且用以验证假设的史实材料也必定不算详尽。日后希望能继续深入思考，完善假设及材料，从而加强研究的深度及逻辑的完整度。

# 新闻的姿态，披荆而行

沈钦韩（我院 2016 级硕士，2019 年 6 月毕业）

不知不觉，踏入职场已经 3 月有余，从校园到社会我经历了平稳的转变，其中的酸甜苦辣或许不如初至单位所设想的那般浓烈，节奏转变的震荡也似乎没有烙印在我这个“小白”身上，概括而言，便是一步一个脚印，细嗅蔷薇。但回想起漫长的求职季以及刚接手工作后的惴惴不安，内心还是几多触动，希望借助笔端淡淡描述，倾诉内心的情感。

去年的这个时候，可以说仍旧急躁不安地徘徊在求职的大门外，希望能手握一把金钥匙，迅速而又稳妥地进入这个似乎触手可及却又遥遥相望的门后世界。那时的我用老生常谈的一个词来形容便是“迷茫”的。的确，从交换回国后，我踌躇满志地将重心倾入媒体行业，于是斗志昂扬地在浙江广电实习了整个暑假，其中经历了抗击台风的艰辛，也经历了新电视节目从策划到落地的欣喜和感动，更是乐此不疲于每次普通的采访，但是当实习行将结束时，却有怅然若失之感。电视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节奏使我有些难于适应，新闻报道的方式也似乎离我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我似乎难于满足地面频道的“自娱自乐”，于是心有不甘后决定暂别媒体行业。

接下来的秋招季，我尝试了几乎所有同学都会选择的互联网、地产、银行以及国企，但是每每面对简历上与媒体相关的实习经历，脑海里那些跳跃的光点又不断浮现。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踌躇和尝试后，我最终觉得媒体仍然是最适合自己的，在与一众好友交流并汲取了上海媒体行业的相关攻略和经验的的知识后，我重振旗鼓再次踏上了做回媒体人的道路。

上海的媒体行业相较于浙江电视台来说，辐射面更广，受众更大，媒体机制建设更为成熟和全面，媒体环境也更为多元，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来说，是非常适合进阶和“练级”的。随后经历了漫长的求职以及实习，最终在今年 3 月底我正式拿到了文汇报的 offer，算是为整个求职季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回看这一路漫长却又不断取舍的求职之路，内心满是触动，不妨分享些心得给朋友们。

首先，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便是学校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习惯的培养。不管从事何种职业，求学期间形成的习惯都将获益终身。对于我而言，我从事的不仅仅是媒体行业，更是选择了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国际新闻岗位，华东师大国际新闻学院对我的培养和春风化雨般的熏陶在如今看来可谓重要。国际新闻讲究严密的逻辑

辑结构，各段以及各句话之间都需要有逻辑上的联系，新闻事件中某个主人公的行为一定是由因和果支撑的，所以在写作时不能忽视这一点。这也正是我在研究生期间学习专业课程时所学习和领悟到的。同时，在部门中，我属于国际关系“科班”出身，这意味着我在写稿或是外出采访报道时多了一重“专业视角”，在组稿和选题时也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快速而准确地捕捉有用信息。所以，无论在未来踏入哪块领域，都要“不忘初心”，努力汲取求学阶段的养分。

其次，求职并不局限于秋招或者来年的春招，求职是一个漫长且不断更新完善目标的周期。可以说，在刚入学或者研二开始之际，便要树立起自身的职业目标，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自己“添砖加瓦”，比如“武装”自身的职业技能，寻找类似的实习，不断培养自身的职业敏感性和专业性。最后的工作其实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结果，只是对长期实习的一个检验和收获。我非常感激去年暑假忙碌而又充实的媒体实习经历，一周“单休”、每周出差、紧凑的报道制作节奏，这些看似充满挑战的任务对于自身的能力培养和抗压提升来说，其实大有裨益。

但也要辩证看待实习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实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范围的选择，有经验的人力资源老师在面试时，不会回避的一个问题便是实习的经历，并且对面试者有了先入为主甚至是固定的印象，这是没法改变也非常合理的情形。同时，在长期的实习过程中，求职者也会形成在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和习惯。所以，求职者要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并且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求职选择。当然了，实习不必然与工作相绑定，人具有充分的创造性，如果想尝试新领域，也大可以做足准备，与相关有经验的前辈们多做交流，夯实自身的基础。